



2002

中国小说学会 排行榜

世纪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2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1-6301-7

I. ① 2… II. ① 中… III. ①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029 号

2002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30mm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544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301-7

定 价 6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序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关于 2002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其它

雷 达

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已经举行了三届。起先不是没有被怀疑、误解和非议，后来情况渐起变化，尤其到现在它在公众和文坛的口碑，似乎偏向于肯定的居多。窃以为这是很不容易的。权威性和公众性的建立，既需要实践的检验，也需要时间的累积。当虚假、矫情、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之风甚烈，商业利益的驱动无处不在之时，要让人们相信一点真实的东西，似乎也变得困难了。然而，中国小说学会的这个“中国小说排行榜”，由于不带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虽不敢说它绝对纯粹，却可以说其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当然，对于同一年度的创作，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排出差异较大的名单，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谁拥有惟一与绝对。这里我就 2002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及相关情况，谈谈我眼中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到底怎么样，再从几届排行榜看看我们的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因为是参与者，比较知道内情，先说说这个排行榜是怎么产生的，参与者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若何。在浩如烟海的作品堆里挑出一些优秀的或有价值的作品，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对读者和文坛都极其需要，而且具有信息引导意义，只是劳动量大得惊人。在每次评选之前，小说学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评委——主要是高校的一班教授们，即组织他们的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展开了初选。他们在近一年间，密切关注创作态势，与教学工作联系起来，集中阅读上千件中长短篇小说，遂为评选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备来年的正式评选。金汉先生在浙江师大，公仲先生在南昌大学，吴义勤先生在山东师大，王科先生在渤海大学，还有湖南的李运抃、上海的杨剑龙诸先生，大都发动学生投入筛选选工作。评委 25 人，涵盖面也比较宽广，由来自全国各地长期从

事小说理论研究、小说评论，以及创作的专家、学者、作家构成。评委会形成了并非刻意为之的“三结合”格局，即：教授、学者、评论家的结合；高校、研究所、作家协会的结合；还有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评委的结合。于是，正像会长冯骥才先生所描述的：其中既有何向阳、洪治纲、阎晶明、谢有顺、杨扬、李国平这班评坛新锐，也有陈骏涛、李星、夏康达、盛英等评坛宿将，更有那汤吉夫、陈冲、韩石山等一身而二任的作家型评论家，可谓代表性、学术性、专业性兼而备之。

我以为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小说学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研究小说的民间社团，明确提出了艺术性、专业性和民间性的评选标准，提出一切从文本出发，只面对文本的要求。这是颇为明智的。它有一系列的“不考虑”：不考虑作家的名气，不考虑作品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不考虑作家的年龄，性别，地区诸因素，更不考虑评委与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于是尽可能地将非文学因素排除在外，于是排行榜不时出现了如下情景：有些人气很旺的名家的某作品落了马；有些在别处获了大奖的作品在排行榜中却不见踪影；有些在媒体上喧腾一时的作品却遭到淘汰；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一夜之间，跃升榜眼。这一切其实是很正常的，所谓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为智。真正有潜力的新进才俊可乘势而起，真正有底气的名家有可能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激发。

在我看来，另一点也很重要：这个排行榜是没有奖金的，上了榜的作者，没钱，只有一种承认，一种评价，一种荣誉。这在商品化时代比较稀见。据说不少上榜作家还是很兴奋，他们不在乎钱。这就对了。写作者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不就是才情和创造力的竞争吗？现在高金额的大奖频频出马，企业家豪气入云，斗胜争富，大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势头，好像奖金越高评奖档次也越高，作品的艺术性也跟着高了上去。事情当然决非如此简单。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我不担心别的，只担心没那么多配得上巨额奖金的作品，也就是说，担心好作品的生产速度赶不上奖金增长的速度。

若问这届排行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我以为是在严格权衡艺术质量的前提下，突出了“双新”——一是拔擢新人；二是鼓励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事实上，这也是连续三届排行榜的共有特色。先说新人。前年的排行榜就曾冒出几个不为人注意的新角色。赫然上榜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其作者雪漠，是甘肃武威的一个小学教师，农家子弟，一直在贫困和艰窘中拼搏。他用多年时间写成的这部长篇，是从他的刻骨体验，从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严峻生存中提炼而出的。在书中，西部农民那顽强、坚韧、诚实、豁达的形象被描绘得十分深刻，人物的复杂性被揭示得惊心动魄，而“大漠”作为一种雄浑的、酷烈的意象，强有力地抒发着西部生存的诗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大

漠祭》的语言也很鲜活，富于质感，生动而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耐人咀嚼。应该说，雪漠及其《大漠祭》的日益为人所知，与中国小说排行榜有较大关系。连续两届以短篇《准备好了吗》和《把门关上》上榜的戴来，是从苏州嫁到河南新乡的一个自由撰稿人。她曾是所谓“七个美女作家”之一，媒体上很宣传过一阵子。其实，她的创作跟人们熟知的某些美女作家的路径并不相同。作为新生代女作家，戴来除了新一代共有的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新异的看事物眼光外，还突出的显现了其特有的艺术个性。在创新与传统、虚与实、荒诞与逼真、假定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上，揉和的比较自然，于是能在朴实的形式里装戴现代性的感悟。她重视小说的故事性并讲究构思的巧妙和意外。善于观察和表现生活中某些微妙难言的情境。当然是以新生代特有的方式。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而她又总能写出这些不同年龄的男子无奈而尴尬的生存情状。戴来于去年摘去了首届春天文学奖（专门奖给30岁以下的新人的奖项）的桂冠，实非偶然。张者也是今年引人注目的新秀，在去年的排行榜上，他的中篇《唱歌》仅居方方《奔跑的火光》之后，名列第二，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他擅长表现青年知识者的苦闷和困惑，表现当今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的生存相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分化，作品充满了机趣和芒刺，让人蓦然想起其灵感也许来自以钱钟书为代表的知性传统。

本届排行榜的新人同样惹人注目。因为只是面对文本，以致长篇头一名《解密》的作者麦家的来历，谁也说不清，简直像一个谜。《解密》的大获青睐，无疑有其题材优势，仅就它以波诡云谲之笔刻画了容金珍这位数学奇才的惊人智慧和悲惨命运而言，已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但它的优胜又并不只在题材。作者描写了天才的强大，也写了天才的脆弱，那假定性的设密与解密，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长篇《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作者张懿翎同样值得一谈。她是资深编辑，以为人作嫁谋生，其才华难得有充分展露的机会，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化似乎也在鼓励他们最好放弃自己的写作。当张懿翎把这部凝结着她刻骨的人生体验的作品捧出来时，读者大感惊讶，其语言风格就令人称奇。人们不因其出于一位编辑之手，或轻看它或高看它，这显示了某种公正性。这次天津作家王松以一篇《红汞》浮出，也是一个亮点。王松写了好多年，其作品大都在重要刊物上刊出，他本人则从死亡边缘上爬回来，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写作。但他经常不可思议地总是被“漏掉”，直到去年才出了第一本书，个中原因颇难索解。这次他作为“新人”被发现，虽然晚了一点，仍不失“发现”的意义。

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说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是不错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写实之风覆盖了文坛，整个小说界缺乏想象力、虚构力和假定能力，虽然关注

生活的焦点在不断变换，但在艺术上比较单调。我们的作家总是喜欢背对未来，面对历史。依我看，现在我们又到了呼唤打破传统写法的时候了。比如，陕西的红柯，固然并非新手，他主要在中短篇领域活跃，前年有中篇《库兰》上榜，但去年其长篇《西去的骑手》之被推举，却包含着出新之意。作品写新疆往事，以著名的朶司令马仲英气吞万里如虎的英姿和盛世才极具魔力的性格为基本支点，以充满英雄豪气和浪漫色彩的语言，展开了一幅奇异而雄浑的野史长卷。我理解，评委们之所以垂青于它，恐怕主要还是看好作者风格的罕见——在这个物质化实惠化的时代，马仲英的强悍而奇崛的形象，无论在审美价值上还是人文价值上都是卓尔不群的。上一届李洱的《花腔》，最大特色在于叙述上的创新和历史观上的崇尚偶然性，以几个当事人的口述和大量引文来交叉叙述，不同人物以不同的腔调言说同一历史迷案，故有“花腔”之称。这种实验小说，或先锋性长篇，在今天无异于凤毛麟角，排行榜将其醒豁地提出，便有了文学生态学的某种意味。以上一届上榜的六部长篇而论，莫言在《檀香刑》中对民族化，民间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成一在《白银谷》中的宏大叙事，阎连科在《坚硬如水》中的解构文革，阎真在《沧浪之水》中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都各有新的开掘和延展。这届排行榜，似乎更加注意到了创新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例如毕飞宇，他连续以中篇《青衣》《玉米》上榜，这届又以短篇《地球上的王家庄》上榜。并非评委们格外垂青于他，而是他确乎能不断拿出新鲜的成果，每部皆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不论对女性的理解还是对乡土的理解。如果说中国小说排行榜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到形式的创新上了，那倒也真是摸准了它的取向。形式是内容的积淀，有时候形式确能起到决定作用。在这里，我无法一一评述本届排行榜和上几届排行榜的作品，只能撮其要点，略加点评。要问，从连续三届排行榜的作品能看出些什么？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中国当代小说仍在生长着，发展着，日渐成熟着，并不断显示其活力——活力的重要表现是沿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现代意识的本土化借鉴，一是传统资源的现代化改造。也许，我们与世界意义上的小说艺术还有差距，但我们正在稳步地前进。

目 录

序：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关于200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其它	雷 达	1
----------------------------	-----	---

短篇小说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1
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世界——评《地球上的王家庄》	杨 扬	7
黑猪毛 白猪毛	阎连科	9
感伤：生存的无奈与生命的荒唐——评《黑猪毛白猪毛》	王 科	22
猫与鼠 也缠绵	陈忠实	25
以戏剧性的情节揭示反腐败的重要性 ——评《猫与鼠 也缠绵》	杨剑龙	36
库麦荣	贾平凹	38
扰攘市声中的天籁之音——评《库麦荣》	李 星	46
白雪猪头	苏 童	48
世俗中寻觅真情——评《白雪猪头》	陈公仲	55
上 边	王祥夫	57
脆弱是一种美——评《上边》	阎晶明	68
我爱小丸子	潘向黎	70
“惹”味时尚女性及其塑造——评《我爱小丸子》	盛 英	83
突 厥	杨剑敏	85
让精神点亮生命——评《突厥》	张渝生	97

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 然	100
小说中“物事”的设置与运用		
——评《李大筐的脚与李小筐的爱情》	韩石山	115
给马兰姑姑押车	刘玉栋	117
成长的另一种仪式——评《给马兰姑姑押车》	洪治纲	126

中篇小说

遥远的温泉	阿 来	128
沉重的叹息——评《遥远的温泉》	李大鹏	178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180
意味深长的“鸣叫”——评《松鸦为什么鸣叫》	李运抟	220
红 汞	王 松	223
“恶”与“恶”的撞击与互动——评《红汞》	夏康达	256
瓦城上空的麦田	鬼 子	258
卑微的神灵——评《瓦城上空的麦田》	何向阳	318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	321
当心灵在不意间擦伤——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谭 湘	358
救灾记	陈世旭	360
现实和精神——评《救灾记》	李国平	412
七宝楼台	陈 平	414
走向心灵深层——评《七宝楼台》	张春生	459
猜到尽头	东 西	461
生命毁于无尽的猜疑——评《猜到尽头》	金 汉	488
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	490
忆念与审视——评《过滤的阳光》	陈骏涛	527

家 园.....	艾 伟	530
让诗性在苦难中飞翔——评《家园》	洪治纲	564

长篇小说

解 密.....	麦 家	566
一部充满思想和艺术张力的小说——评《解密》	吴义勤	569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张懿翎	571
磨灭不掉的记忆——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雷 达	574
远去的驿站.....	张一弓	577
历史的“张看”——评《远去的驿站》	何向阳	580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会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没有一只鸭子肯老实地呆上一分钟。我数过一次，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子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每天天一亮我就要来放鸭。我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螃蟹没有，虾也没有。水底下的动物没有一样用得着脖子，张着嘴就可以了。最极端的例子要数河蚌，它们的身体就是一张嘴，上嘴唇、下嘴唇、舌头，没了。水下的世界是一个饭来张口的世界。

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我们在空气中呼吸，而那些鱼在水中呼吸，它们吸进去的是水，呼出来的同样是水。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哭了，我们的悲伤会变成泪水，顺着我们的面颊向下流淌。可是鱼虾们不一样，它们的泪水是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由下往上，在水

平面上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当我停留于水面上时候，我觉得我飘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够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

但是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父亲每天都在等待，他在等待天黑。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的，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们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沉默的夏夜迷恋上了宇宙，可能也就是那些星星。星空浩瀚无边，满天的星光却没有能够照亮大地。它们是银灰色的，熠熠生辉，宇宙却还是一片漆黑。我从来不认为那些星星是有用的。即使有少数的几颗稍微偏红，可我坚持它们百无一用。宇宙只是太阳，在太阳面前，宇宙永远是附带的，次要的，黑灯瞎火的。

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状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天井里，翘着腿，指头又长又白，纸烟被他的指头夹在中间，安安静静地冒着蓝烟，烟雾散开了，缭绕在他的额头上方。父亲的手真是一个奇迹，晒不黑，透过皮肤我可以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父亲全身的肌肤都是黑乎乎的。然而，他手上的皮肤拒绝了阳光。相同的状况还有他的屁股。在父亲洗澡的时候，他的屁股是那样的醒目，呈现出裤衩的模样，白而发亮，傲岸得很，洋溢出一种冥顽不化的气质。父亲的身上永远有两块异己的部分，手还有屁股。父亲的眼睛在大白天里蔫得很，偶尔睁大了，那也是白的多，黑的少。

北京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诗，她说：“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我觉得女诗人说得好。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她描述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同时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世界地图被父亲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余。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离开了我的家。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年龄段，很自然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们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第二，这一点是王爱国提出来的，王爱国说，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去呢？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可以说暮色苍茫。还是王爱国首先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害怕的问题。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那个深渊无疑是一个无底洞，这就是说，我们掉下去之后，既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一直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恐惧，无边的恐惧，无止境的恐惧。因为恐惧，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国的话立即受到了质疑。王爱贫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王爱贫说，他看地图看得非常仔细，世界的尽头并不是陆地，只不过是海洋，并没有路，我们是不会走

到那里去的。王爱贫补充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王爱贫言之有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了。王爱国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贫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形势相当严峻，可以说危在旦夕。是啊，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假如我们坐的是船，永远坠落的将不只是我们，还得加上一条小舢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几个岁数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说实话，我们已经不敢再听了。就在这个最要紧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王爱贫没有正面回击王爱国，而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这是不可能的！”王爱国说：“为什么不可能？”王爱贫笑了笑，说：“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请问，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

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并没有插上翅膀，并没有咆哮而去，安静得像一口井。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我们坚信，有水在，就有我们在。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了世界。我们都一起看着王爱贫，心中充满了爱戴与崇敬。他为这个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我还是有疑问。在大西洋的边缘，满世界的水怎么就没有淌走的呢？究竟是什么力量维护了大西洋？我突然想起了《世界地图》。可以肯定，世界最初的形状一定还是正正方方的。大西洋的边沿原来肯定是直线。地图上巨大的外弧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是被海水撑的，像一张弓，弯过来了，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崩溃的危险性。然而，它终究没有崩溃。这是一种奇异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不敢承认的力量。然而，是一种存在的力量。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大西洋的边沿一旦决口了，海水会像天上的流星，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水都是手拉手的，它们只认识缺口，满世界的水都会被缺口吸光，我们王家庄鲤鱼河的水也会奔涌而去。到那时，神秘的河床无疑会袒露在我们的面前，河床上到处都是水草、鱼虾、蟹、河蚌、黄鳝、船、鸭子，也许我们家的码头上还会出现我去年掉进河里的五分钱的硬币。可是，五分钱能把满世界的水重新买回来么？用不了两天这个世界就臭气熏天了。我愣在那里，我的心像夏夜里的宇宙，一颗星就是一个窟窿。

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一心没有二用。满天的星光，交相辉映，全世界只剩下我和我的父亲。我说：“爸爸。”父亲没有理我。过了好半天，父亲说：“我们来看看大熊座。这是摇光，这是开阳，依次是玉衡、天权、天玑、天璇、

天枢，北斗七星就是官们。儿子，我们现在沿着天璇和天枢五倍远的距离，喏，这个，最亮的一颗，”父亲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他手里的手电，夜空立即出现了一根笔直的光柱，银灰色的，消失在遥不可及的宇宙边缘。父亲说：“看见了吗？这就是北斗。”我看不见。我没有耐心关心这个问题。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儿？”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没有了反光手电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笑了。父亲的笑声里有难得的幸福，像星星的光芒。有一点柔弱，有一点勉强。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回去睡吧。”我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它们全力以赴地吃，全力以赴地喝。它们完全不能理会我内心的担忧。万里无云，宇宙已经没有了，天上只有一颗太阳。乌金荡的水把天上的阳光反弹回来了，照耀在我的身上。我的身上布满了水锈，水锈是黑色的，闪闪烁烁。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内心通体透亮。乌金荡里只有我，以及我的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我承认我有点恐惧。因为我在水里，我在船上。我非常担心乌金荡的水流动起来，我担心它们向着远方不要命地呼啸。对于水，我是知道的，它们一旦流动起来了，眨眼的功夫就会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黄鳝，你怎么用力都抓不住它们。最后，你只能看着它们远去，两手空空。

这一切都是《世界地图》闹的。可是我不打算抱怨《世界地图》什么。即使没有那张该死的地图，世界该是什么样一定还是什么样。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我甚至恨起了我的父亲，人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你不问不管，你去操宇宙的那份心做什么？北斗星再亮也只是夜空的一块疤，它永远不可能变成集体的财产，永远不可能变成第八十七只或第一百零三只鸭子。甚至不可能变成第八十七只或第一百零三粒芝麻。

然而，危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诱惑力的。它使我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想象。我的思绪沿着乌金荡的水面疯狂地向前逼进，风驰电掣。一直来到大西洋。大西洋很大，比乌金荡和大纵湖还要大，突然，海水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笔直地俯冲下去。这时候你当然渴望变成一只鸟，你沿着大西洋的剖面，也就是世界的边沿垂直而下，

你看见了带鱼、梭子蟹、海豚、剑吻鲨、乌贼、海鳗，它们在大西洋的深处很自得地沉浮。它们游弋在世界的边缘，企图冲出来。可是，世界的边沿挡住了它们。冲进来的鱼“铛”地一下，被反弹回去了，就像教室里的麻雀被玻璃反弹回去一样。基于此，我发现，世界的边沿一定是被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固定住的。这种物质像玻璃一样透明，玻璃一样密不透风。可以肯定，这种物质是冰。是冰挡住了海水的出路。是冰保持了世界的稳固格局。

我拿起竹筒，一把拍在了水面上。水面上“啪”的一声，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窜。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超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

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满怀斗志，满怀激情，就是找不到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

我是第二天的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第二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两位社员没有把我交给我的父亲，直接把我交给了队长。队长伸出一只手，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支书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父亲的手很白，冰凉的。父亲掐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这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作者简介】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3年，后从事新闻工作，1998年入江苏作协，任某杂志社编辑至今。

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出版长、中、短篇小说计150万字，并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睁大眼睛睡觉》《青衣》《款款而行》等多部。

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世界

——评《地球上的王家庄》

杨 扬

可能是一种批评的惰性吧，一论及80年代以后出道的作家作品，人们总是眼睛盯着语言，好像除了语言之外，小说没有别的东西可谈。所以，也难怪深受这种批评之害的年轻作家，作品中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所谓叙述策略，在叙述的语言上忙上忙下做尽手脚，自以为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业之功，但结果是把这些年轻作家作品放在一起阅读时，那种雷同和重复的语言比比皆是，读之不是味尽甘来，而是犹如嚼蜡。作品中那拗口的语言，似乎不是中国人在叙述和说话，倒是外国人或是翻译小说中的那腔调。小说的语言实验落到这样的地步，可以说是气数已尽。

当初读毕飞宇的小说，如《款款而行》时，我想他是属于上述那一路作家的，因此也并不看好他的写作。但后来的情况有了变化，这是指他在中篇创作上的转变。《玉米》、《玉秀》好像使毕飞宇的创作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装腔作势地模仿80年代后期先锋派的腔调，绕口令似的叙说所谓的“文革”经验，或是“我爷爷”、“我奶奶”的往事，而是开始正视自己的经验，写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作品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语言也从原本的学生腔、翻译腔，回落到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用语。与他的中篇小说创作相

对照，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更像是发生在毕飞宇身上的一个奇迹。说它是奇迹，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可遇而不可求。作品呈现的经验是小孩特有的，而故事的构成是想象之中的事。读这篇小说，你一方面会觉得所有故事中发生的一切离你是那样的近，仿佛作品中的王家庄就在眼皮底下，那赶着一大群鸭子准备周游世界的8岁孩童就曾是自己拥有过的。但另一方面，读着读着你又会觉得作品离你是那么远，语言仿佛长上了飞翔的翅膀，在想象中遨游，有着一种高妙凌空的飘渺之感，你会由衷地赞叹作者奇妙的想象力，那是只有很少的作家作品才能抵达的创作高度。

的确，在所有有关“文革”的写作中，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是值得重视的。作品以一个8岁小孩的视角来叙述这段历史。这样的视角以及相近的内容，可能在近2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屡见不鲜，但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却能从这么多的同类写作中脱颖而出，实在有其不俗的表现在其中。在我看来，是毕飞宇找到了只有他自己才有的艺术感觉经验。假如他还是一味地以控诉的方式来表现这段生活，那么，毕飞宇只能跟在巴金、王蒙或是张承志等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装模作样地表述“他人”的经验而已。因为对那些亲历过“文

革”，并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知识分子而言，“文革”确实是一场噩梦。但对于一个未经人事练达，根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孩童而言，如果他的表述与那些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感受完全一致的话，那么，要么是小孩的感觉方式出了问题，要么是作家自己的想象出了问题。而从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题材上的无所进展情况看，问题可能更多地存在于作家自身的精神障碍上。我想，“文革”在今天的文学表现中是被模式化了。“文革”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苦难的堆积，只要轻描淡写地陈述一番当年的血泪史，便会很容易地招来一些人的廉价赞美。相比之下，我感到以欢乐的方式处理“文革”比那种哭哭涕涕的眼泪更有穿透力的艺术诱惑。化重为轻，以轻逸的姿态描写沉重的历史，捷克作家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作家中，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以近似的方式描写了反右时期的生活场景，孩童的欢乐与想象中沉重的政治氛

围对比，更显示出生命的顽强。而在“文革”题材上，《地球上的王家庄》是第一次以一种欢乐的而不是乌托邦的方式展示了真正属于孩童的想象世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用“文革”的乌托邦的语言方式展示了“文革”经验，但感觉上还是悲剧式的）。当我们在孩童的身上感受到一种难以压抑的欢乐时，相对应的那种成人身上的压抑就显得渺小和脆弱多了。同样，在所有人都愁眉苦脸、不知所措之时，孩童的欢笑反显得更加有力。

作家应该有一种智慧，一种应对苦难的人生智慧。在苦难面前，有的人是沉下去，与苦难一起悲壮地牺牲。但有的人有自己的追求，他们做着与苦难不相干的自己的事，让自己的思想被自由的想象所充实，以此来瓦解苦难的折磨。这后一种人生往往被人们视为是“精神胜利法”，但我以为其中未必都是消极的，至少《地球上的王家庄》在表达上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比苦难更为深厚的人生感受。